

## 論〈王風〉詩中的禮教思想

林素英<sup>\*</sup>

### 摘要

周族溯自公劉徙居於豳，歷經古公遷岐而卜居周原，周民族已日漸壯大。繼而文王居豐，武王居鎬，於是王業勃興，號稱宗周。至於成王，周公始營洛邑，以其地處中心，故為時會諸侯之所，於是豐鎬號稱西都，而以洛邑為東都。逮及幽王昏庸暴虐，嬖倖褒姒而廢申后，廢太子宜臼以立伯服，卒引發犬戎之禍，而西都多淪為廢墟。隨後，晉文侯、鄭武公等擁立宜臼為平王，終以局勢混亂之故，平王東遷洛邑，號稱王城。東遷之後，所採有關王城之風體詩，即謂之〈王風〉，形成此〈風〉的特殊背景。職此之故，本文即將結合相關之出土文獻以及《詩序》、《詩集傳》與清代重要說《詩》等傳世文獻的論述，就〈王風〉十首詩之內容，區分為世亂民離詩、征夫訴怨詩以及男女相悅思念詩三類，分別從禮俗或禮義之角度，論述其真情有禮的《詩》教思想以及禮教真義。

關鍵詞：王風 禮教思想 詩序 詩集傳 清代詩說 出土文獻

---

<sup>\*</sup>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

## 一、前言

周族之興，自公劉徙居於豳起始，歷經古公避狄而遷岐，下逮卜居周原，而周民族業已日漸壯大。繼而文王居豐，武王居鎬，於是王業勃興，謂之宗周。至成王，周公始營洛邑，以其地處中心，故為時會諸侯之所，於是豐鎬號稱西都，而以洛邑為東都。逮及幽王昏庸暴虐，嬖倖褒姒而廢申后，廢太子宜臼以立伯服，卒引發犬戎之禍，致使西都多淪為廢墟。隨後，晉文侯、鄭武公等擁立宜臼為平王，終以局勢混亂之故，平王僅能東遷洛邑，號稱王城。此後所採有關王城之風體詩，即謂之〈王風〉。〈王風〉基於上述之歷史背景，十首詩之中，又大體可分為三類，其中自然以描述社會動亂情況之下，宗室殘破、人民流離失所的悲涼情況者最多，此外，亦連帶衍生征夫戍卒的怨訴一類之詩，最後一類，則有關於男女相悅、彼此思念的互古賦詩主題。以下即按照此三大類分別論述如下：

## 二、世亂民離詩的禮教思想

犬戎之禍後，周王室遭遇重大顛覆，元氣耗損極為嚴重，不得已而播遷於東，導致社會各處瀰漫著亂離悲涼之氣氛。這種亂離悲涼之感即成為〈王風〉中之主體氛圍，而〈黍離〉、〈君子于役〉、〈兔爰〉、〈葛藟〉即屬之。此外，主要導因於此社會大變動而產生的家庭悲劇者，又有〈中谷有蓷〉悲憫嫠婦的詩篇，同時還有象徵苦中作樂的〈君子陽陽〉之詩，因而可再區分為三類而言之：

### （一）描述時局亂離的人生苦痛詩

〈黍離〉一詩，《韓詩》以為此詩乃尹吉甫信後妻之讒，而殺孝子伯奇，其弟伯封求而不得，遂作〈黍離〉之詩。<sup>1</sup> 然而以如此具體人事指實之說法，由於缺乏充分之憑據，且詩文之中絲毫沒有家庭遭變之痕跡，因而後人鮮少採用此說。《詩序》以此為「閔宗周也。周大夫行役，至于宗周，過故宗廟，宮室盡為禾黍。閔周室之顛覆，徬徨不忍去，而作是詩也。」<sup>2</sup> 朱熹上承《詩序》之說，且引元城劉氏「常人之情，於憂樂之事，初遇之，則其心變焉。次遇之，則其變少衰。三遇之，則其心如常矣。」之說，而認為詩人「既歎時人莫識己意，又傷所以致此者，果何人哉。」皆表示「追怨之深」之意。<sup>3</sup> 姚際恆以為「閔宗周」之說，乃泥於箕子之歌為說，《新序》以衛伋閔弟壽見害而作為無稽，《韓詩》以伯封作此詩為依託妄

<sup>1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王先謙：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（臺北：明文書局，1988年），頁315。

<sup>2</sup> 《詩序》，見於〔漢〕毛亨傳，〔漢〕鄭玄箋，〔唐〕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收入《十三經注疏（附〔清〕阮元校勘記）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5年），頁147。

<sup>3</sup> 其詳參見〔宋〕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，頁42-43。

言。<sup>4</sup> 方玉潤則以爲「惟是周轍既東，無復西幸。文、武、成、康之舊，一旦灰燼，蕩然無存。有心斯世者，所爲目擊心傷，不能無慨於其際焉。」且「三章只換六字，而一往情深，低徊無限。此專以描摩虛神擅長，憑弔詩中絕唱也。」<sup>5</sup> 崔述雖然也認同毛《序》感傷時事之說，然而卻認爲「心憂」、「何求」之語，乃憂未來之患，而不似傷已往之事。<sup>6</sup>

總體而言，〈黍離〉一詩應可確定爲感傷時事之詩，倘若將此感傷連結崔述憂慮未來之患的說法，則更能彰顯憂傷之深情。全詩雖有三章，然而三章之中僅僅更換六字，主要藉由重疊之語句以及回環反覆詠歌之方式，而造成氣氛感人的藝術效果。全詩三言「彼黍離離」，以對照「彼稷」之苗、穗與實之變化，且應之以「搖搖」、「如醉」、「如噎」逐漸加重的傷心之情，則景象於虛實遞變之間，鬱結難釋的濃密情感已躍然紙上。三章之中，又以「迴蕩」之語法重複出現「知我者，謂我心憂；不知我者，謂我何求。」的語句，雖未明言所憂、所求，然而詩人心中酸、甜、苦、辣、鹹五味交織雜陳的情感，早已傳達至讀者心中，而使讀者順利接收其一往情深、綿綿不已的情思。最後，再於每章之末重複「悠悠蒼天，彼何人哉！」之言，則怨傷之深情雖然三致其意，不過仍舊保持《詩》教溫柔敦厚之本色，而合於發乎情而止於禮義的禮教要求。蓋禮之用，必須以合於「時」者爲大，<sup>7</sup> 時機若不成熟，多言，非僅無益，甚且還有大害。詳究周王室之出現危機，本非始自平王東遷之後，不過，縱使賢者可以洞察危機於先，然而一般人或者安於逸樂，或者懼於幽王之淫威，總無法察覺山雨欲來風滿樓之變，因此賢者與其躁進而動、憤激以言，不但無濟於事，而且徒然使自己陷於危險的環境之中，於是僅能呼告蒼天以求明鑑，而留下「彼何人哉！」徒呼奈何之吁歎。人窮而呼天，則憂傷之情益深，卒至豐、鎬陷入一片烽火，平王不得不東遷王城，賢者撫今追昔，只能無語問蒼天！所謂禮者，本無他，乃所以合理調節人情而已矣！〈王風〉將此詩置於首篇，更有開啓王室從此積弱不振的哀痛之意。

〈君子于役〉一詩，《詩序》以爲「刺平王也。君子于役無期度，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。」<sup>8</sup> 朱熹不同意此詩爲大夫刺平王之詩，而認爲「君子」乃婦人目其夫之辭，且以全詩乃展現婦人對於行役君子的憂之深與思之切之感。<sup>9</sup> 姚際恆又以爲此詩寫日落懷人之真情實境，乃婦人思夫赴遠行役之作。<sup>10</sup> 方玉潤也認同此詩乃婦人思夫遠行無定之作，且認爲「詩到真極，羌無故實，亦自可傳。使三百詩人，篇篇皆懷諷刺，則於忠厚之旨何在？於陶情淑性之意又

<sup>4</sup> [清]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62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頁71。

<sup>5</sup> 其詳參見[清]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），頁191-192。

<sup>6</sup> 其詳參見[清]崔述：《讀風偶識》（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卷3，頁1。

<sup>7</sup> 《禮記》〈禮器〉，見於[漢]鄭玄注，[唐]孔穎達等疏：《禮記正義》，收入《十三經注疏（附清·阮元校勘記）》，頁450：「禮，時爲大，順次之，體次之，宜次之，稱次之。」

<sup>8</sup> 《詩序》，見於《毛詩正義》，頁148-149。

<sup>9</sup> 其詳參見[宋]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43。

<sup>10</sup> 其詳參見[清]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，頁71。

何存？此詩言情寫景，可謂真實樸至，宣聖雖欲刪之，亦有所不忍也。又況夫婦遠離，懷思不已，用情而得正，即《詩》之所為教，又何必定求其人以實之，而後謂有關係作哉？」<sup>11</sup> 方氏之說可謂持平之論。

周王室東遷洛陽之罪並不在平王，因而朱熹不以此詩譏刺平王，而為婦人憂思出征夫君之詩，確為有識之見；方玉潤之評，則更臻於極致。蓋人倫之本，肇始於夫婦有定，此從〈郊特牲〉「男女有別，然後父子親，父子親然後義生，義生然後禮作，禮作然後萬物安。」〈昏義〉「男女有別，而后夫婦有義；夫婦有義，而后父子有親；父子有親，而后君臣有正。」之說法，已可知其然；再對照〈中庸〉「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。」之說，更可確定其義。<sup>12</sup> 此說法，同時又可以與《易》「有天地，然後有萬物；有萬物，然後有男女；有男女，然後有夫婦；有夫婦，然後有父子；有父子，然後有君臣；有君臣，然後有上下；有上下，然後禮義有所錯。」<sup>13</sup> 之說相對應。至於戰國竹簡〈六德〉「生民斯必有夫婦父子君臣」，且以「夫、婦、父、子、君、臣」為「六位」之載，<sup>14</sup> 即可見此三組六位之「三親」關係，乃人際關係中最基本且不可割捨之部分；其中又以夫與婦之關係居首。結合此傳世文獻以及簡文之諸多記載，皆可說明夫婦這一倫於人倫關係之中確實位居首要地位。故而〈君子于役〉以樸質無華之文字，寫夕陽西下時，「雞棲于埘」、「羊牛下來」、「雞棲于桀」、「羊牛下括」之實況，牛羊雞隻等尚且得於日暮之時歸巢以求歇息，然而環顧家中，景物雖然依舊，只是良人卻杳然不知歸期，於是「如之何勿思！」的痛楚，自然強烈觸動婦人懷念征夫之思緒。此乃婦人對丈夫的真摯之情，且衷心希望其於征途中能無飢無渴，得以早日歸來團聚。全詩所呈現者，乃夫婦間一片真實樸質之至情。當夫婦長期兩地相隔之時，苟能擁有如此真摯之情，即能成就夫婦之義，而合乎禮之本的原義。

〈兔爰〉一詩，《詩序》以為「閔周也。桓王失信，諸侯背叛，構怨連禍，王師傷敗，君子不樂其生焉。」<sup>15</sup> 朱熹以詩文有狡兔得脫，雉以耿介罹禍之義，遂上承《詩序》「不樂其生」之說，而有「庶幾寐而不動以死」之說。<sup>16</sup> 姚際恆以為「繻葛之戰以前，周室尚無事。自是而桓文迭興，霸升王降，天下大亂矣！詩人以『我生』初、後為言，此詩史也。」<sup>17</sup> 方玉潤則以「逢時多難，縱欲無生，何至求死？所謂無叱、無覺、無聰者，亦不過不欲言，不欲見，不欲聞已耳。」駁朱熹之說，同時認為全詩乃言都城既遷，王綱愈墜，天下從此多故，然而

<sup>11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，頁193。

<sup>12</sup> 《禮記》〈郊特牲〉，頁506；〈昏義〉，頁1000；〈中庸〉，頁882。

<sup>13</sup> 《易》〈序卦傳〉，見於〔魏〕王弼、〔晉〕韓康伯注，〔唐〕孔穎達疏：《周易正義》，收入《十三經注疏（附清·阮元校勘記）》，頁187。

<sup>14</sup> 其詳參見荊門市博物館編，裘錫圭審訂：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188。

<sup>15</sup> 《詩序》，見於《毛詩正義》，頁151。

<sup>16</sup> 其詳參見〔宋〕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45。

<sup>17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，頁73。

蒼天夢夢，猶如聾聵，故不如長睡不願醒。此所謂不願醒者，又誠非其所願，以致其思愈苦，其心愈傷，乃至不可或已。<sup>18</sup> 崔述則以作此詩者當生於王室未騷的宣王末年，於是目睹東遷後室家飄蕩之亂離場面，遂有「逢此百罹」之傷感與哀思。<sup>19</sup>

遭逢亂世，的確令人萬般無奈；尤其是始生之初年尚稱無事，既長之後始遇兵荒馬亂之災禍者，將此前後時期兩相對比，更會感覺無限悵惘與沉痛。復以奸險狡詐者得以逃脫，而忠直耿介者反罹於羅網，悲憤之餘，於是遂有「尚寐無訛」、「尚寐無覺」、「尚寐無聰」的退縮、厭世思想。此現象雖不免有些消極，不過卻也是人情所可以理解之事。蓋人情之常，渴望泰平之世而不願處於戰亂之局，以忠貞正直為可貴而投機狡猾為可恨，然而不幸之事常與願違，導致思想敏銳者憂憤叢生，實屬常事，然則此激情又必須尋求適當管道發抒以得情理之平衡。固然〈中庸〉所謂「喜、怒、哀、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；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；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」<sup>20</sup> 為正常狀態下處理情感的「中庸」之道，然而生逢亂世之時，欲求人「情」之「發」而能「中節」，實須講求非常時期的非常之法，而不能與治世相同。對照孔子不但自言唯有自己與顏淵有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」的處世之道，且有「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。」之表白；此外，尚且還有「予欲無言。」之語，則知「無言」之做法，亦不失為可行的處世之道。<sup>21</sup> 伯夷、叔齊雖有讓國之賢，然而終以武王伐紂為「以暴制暴」，因此「義不食周粟」，以致餓死首陽山之悲情，<sup>22</sup> 而孔子有「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」<sup>23</sup> 之評，孟子則以伯夷為「聖之清者」之說。<sup>24</sup> 無論孔孟，對伯夷、叔齊都未嘗有鄙薄之語，則詩中以「尚寐無訛」、「尚寐無覺」、「尚寐無聰」之祈願聊以排遣悲懷方式，即使無法列入絕佳的上乘處世之道，然而亦不失處理亂世時的明哲保身之法，而勉強可擠入置身亂世之時的「中節」作法。

〈葛藟〉一詩，《詩序》以為「王族刺平王也。周室道衰，棄其九族焉。」<sup>25</sup> 朱熹以為「世衰民散，有去其鄉里家族，而流離失所者，作此詩以自嘆。」<sup>26</sup> 姚際恆以為《詩序》必謂「刺平王棄其九族」，乃甚無據，而以朱熹之說為是。<sup>27</sup> 方玉潤亦贊同朱熹之說。<sup>28</sup> 至於崔述，

<sup>18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，頁197-198。

<sup>19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崔述：《讀風偶識》，卷3，頁6-7。

<sup>20</sup> 《禮記正義·中庸》，頁879。

<sup>21</sup> 其詳分別參見《論語》，見於〔魏〕何晏注，〔宋〕邢昺疏：《論語注疏》，收入《十三經注疏（附清·阮元校勘記）》，〈述而〉，頁61；〈陽貨〉，頁157。

<sup>22</sup> 其詳參見《史記·伯夷列傳》，見於〔日〕瀧川龜太郎：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（臺北：洪氏出版社，1977年），頁847。

<sup>23</sup> 《論語注疏·述而》，頁62。

<sup>24</sup> 其詳參見《孟子·萬章下》，見於〔漢〕趙岐注，〔宋〕孫奭疏：《孟子注疏》，收入《十三經注疏（附清·阮元校勘記）》，頁176。

<sup>25</sup> 《詩序》，見於《毛詩正義》，頁152。

<sup>26</sup> 其詳參見〔宋〕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46。

<sup>27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，頁74。

則以此詩與王族無涉，而為遷徙之際，平王不能撫恤人民，以致人民流離失所之狀態。<sup>29</sup>

就〈葛藟〉全詩之內容而言，應如朱熹等人所云，乃通寫時勢大動亂下，因為遷徙逃亡，所導致的人民流離失所、骨肉疏離之慘況。至於聞一多則另有他說：以此詩應為婦人自況之詞，以「女子適人，謂其夫之父母為父母，謂其夫之兄弟為兄弟」，故有「謂他人父」、「謂他人母」以及「謂他人昆」之詩；而「我顧」、「我有」、「我聞」皆為親愛之意。<sup>30</sup> 聞氏所說固然於全詩亦可通說，然而其所呈現之狀況，並非女子適人所遭遇之常態，且未必為王室遷都、人民流徙大局勢下之常情，因而本文不採此說，而將此詩視為指涉更廣的描述亂世場景之詩。所謂「遠離兄弟，謂他人父」、「遠離兄弟，謂他人母」以及「遠離兄弟，謂他人昆」者，乃言一般人民於亂世之中，不得已而遠離自己的骨肉之親，以致親如「首足」的父母與情同「手足」的昆弟等「一體」之親，尚且不得相保，則遑論其他諸人。逃難之時，即使迫於時勢，而不得不厚顏地「謂他人父」、「謂他人母」以及「謂他人昆」，企圖攀附一絲絲或親或故之交者，然而人人皆屬泥菩薩過江，自顧不暇，遂有「亦莫我顧」、「亦莫我有」、「亦莫我聞」之慘狀，而終不得果。故而宋代之輔廣已有「世治，則人皆安土重遷，各親其親者，其本性然也；世亂，則人多流離失所，疏其所親，親其所疏者。夫豈性之所欲哉？不得已也。」<sup>31</sup> 之評。面對如此違背親其所親之本性，尚且不得苟活，則怎堪「悲苦」之辭足以言之！

根據《周禮》小宗伯之職的「掌三族之別，以辨親疏--其正室皆謂之『門子』。」之載，參照鄭玄「『三族』，謂父、子、孫，人屬之正名。『正室』，適子也，將代父當門者也。」之注，並查考賈公彥「此『三族』，謂父、子、孫，一本而言；推此而往，其中則兼九族矣。云『辨親疏』者，據已以上至高祖，下至玄孫，傍至總麻；重服者則親，輕服者則疏也。」之疏，<sup>32</sup> 可見最重要的「三族」關係，乃以自己為中心，上則親父，下則親子，於是形成父、子、孫三代一本相承的最親近直系血親關係。至於「其正室皆謂之『門子』」之載，則不應如鄭玄所說，狹隘地僅指「將代父當門」之「適子」，而應是說明所謂「門內」之親的範圍，在「適子」之外，另外還應包括旁支昆弟以及為數甚多之庶出親屬在內，否則經文明載的「皆謂之」之文無法得到解釋。由於「門內之親」的人際親屬網，其支脈已是十分綿密而複雜的龐大組織，因而才有必要設立小宗伯的專職人員，引導區分親屬之間的親疏遠近關係。

再根據〈三年問〉所載，喪期之訂定，乃取法天地四時變化之週期而來，遂有「至親以

<sup>28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，頁198-199。

<sup>29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崔述：《讀風偶識》，卷3，頁6-7。

<sup>30</sup> 其詳參見聞一多：《詩經通義乙》，收入《聞一多全集（四）》（武漢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頁184-185。

<sup>31</sup> 〔宋〕輔廣：《詩童子問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）第74冊，卷2，頁330。

<sup>32</sup> 《周禮·春官·小宗伯》，見於〔漢〕鄭玄注，〔唐〕賈公彥疏：《周禮注疏》，收入《十三經注疏（附清·阮元校勘記）》，頁291。

期斷」之喪期規畫，<sup>33</sup> 故知凡爲期服者皆爲至親之屬。例如昆弟，即以「昆弟四體」的「一體」之親之故，遂服齊衰不杖期之重服。至於爲世父、叔父之旁尊，則緣於其與父親同屬昆弟之親，且延續早期「半族制」婚姻制度下的「諸父猶父」、「諸母猶母」現象，於是世父、叔父可列入「至親」之範圍；而世母、叔母雖然本爲路人，但是因爲與世父、叔父相配，遂有「母」之名，且又與世父、叔父有「合體、同尊卑」之義，所以服制規定爲世父母、叔父母，亦均服齊衰不杖期之重服。基於爲世父母、叔父母皆可推而屬於「至親」之列，且子夏對司馬牛獨無兄弟之憂，而有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？」之說，<sup>34</sup> 於是詩中遂有「謂他人父」、「謂他人母」以及「謂他人昆」之文，冀望對於一般父執輩與平輩者，能比照世父母、叔父母以及昆弟與己的親近關係，從擴大親屬之範圍，以遂其雖「疏」而可躋於「至親」之妄想，從而可以獲得眷顧與垂憐。可惜的是在時局混亂，人情澆薄的社會中，即使出此下策，畢竟也無法如願。若從「禮」一向講求人倫親親的角度而言，由親而疏，乃至於並無五服之親的路人也能有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」之友好與關懷，的確是社會充滿溫馨與和諧之情的表徵；然而從詩中企圖攀附「五服之內，血濃於水」的親情邊緣，卻僅僅只是「奢望」而不可得之尷尬情形，固然可以明顯呈現亂世之下人民孤苦無依的慘狀，不過此一現象，同時也更反襯出人倫親親之可貴，而有人人應切實實踐之的呼籲。

## （二）悲憫嫠婦之詩

〈中谷有蓷〉一詩，《詩序》以爲「閔周也。夫婦日以衰薄，凶年饑饉，室家相棄爾。」<sup>35</sup> 朱熹以爲「凶年饑饉，室家相棄，婦人覽物起興，而自述其悲歎之辭也。」<sup>36</sup> 姚際恆以爲此乃閔嫠婦遭飢饉而作之詩，猶杜詩所謂「無食無兒一婦人」也；先言艱難夫貧，再言不淑夫死，末則變文曰「何嗟及矣！」以歸於無奈，其所謂乾、脩、濕之變化，乃由淺及深，而嘆、歎、泣之反應，亦有其層次遞進之關係。<sup>37</sup> 方玉潤不認同「閔周」之說，而贊同此乃閔嫠婦之詩。雖然《集傳》之說已屬近是；不過，從詩云「有女忼離」之辭，實已說明此非婦人自詠。方氏認爲此詩乃述說當時政府不恤荒政，導致小民流離失所之悲慘現象，藉此以見王政之惡、人民之困，均已至其極。同時方氏還引張載「凡天下疲癯殘疾，惇獨鰥寡，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。」之說，而有「世之讀〈中谷有蓷〉而無以動其悲憫之懷者，吾亦未如之何也已矣！」之悲嘆！<sup>38</sup> 崔述則以此詩乃自鎬遷洛者所作，由於平王無安輯之策，不能撫卹其民，以致夫婦不能相保，而知周之不復振也。<sup>39</sup>

<sup>33</sup> 其詳參見《禮記正義·三年問》，頁962。

<sup>34</sup> 其詳參見《論語注疏·顏淵》，頁106。

<sup>35</sup> 《詩序》，見於《毛詩正義》，頁150。

<sup>36</sup> 其詳參見〔宋〕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43。

<sup>37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，頁73。

<sup>38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，頁196。

<sup>39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崔述：《讀風偶識》，卷3，頁6-7。

全詩三章，首先藉由「中谷有蓷」描述「蓷」之性宜濕，大多生長在海濱池澤地帶的益母草，<sup>40</sup> 如今生長在不常有水的山谷之中，已有所生非其地之遺憾，而更不幸者，乃此不常有水之山谷，偏偏又遇上乾旱季節，正有屋漏偏逢連夜雨以及禍不單行之苦楚，於是以「中谷有蓷，嘆其乾矣！」起興，遂引發「有女仳離，嘅其嘆矣。」而對於流離失所之婦女表示無限悲嘆。然後二、三兩章，再以「中谷有蓷，嘆其脩矣。」、「中谷有蓷，嘆其濕矣。」層次漸進之方式，描述乾旱程度之嚴重，從普通之乾燥，進而至於可以把肉烤成乾肉之地步，再到幾乎完全脫水乾燥之枯乾程度，則其性宜濕的益母草，其結局如何已經不言自明。同時又藉由外在的惡劣環境一層緊似一層，再以「條其歎矣」、「啜其泣矣」悲歎程度一層深似一層相對應，可謂對該婦女之淒慘境況，繼「嘅其嘆矣」之後，更有層次遞進之描述。然而仔細揣想造成此婦女遭遇如此悲慘而令人慨嘆之境遇，則又不能不追溯到「遇人之艱難」、「遇人之不淑」等不幸。然而事已如此，再多的嗟嘆都是無濟於事的，於是「何嗟及矣！」不得不轉為無言的感嘆，其嘆息之意，實為既深且長！

由於詩中有「有女仳離」以及「遇人不淑」之文，因而歷來解詩者，多以當時遭遇凶年饑饉，婦女更因良人之不善而見棄，遂引發詩人之同情，而作詩以代婦女哭訴。此種解法，固然可從全詩並無辱罵、怨恨對方之文詞，而可顯現婦人溫柔敦厚之厚道精神，不過，終有不能盡寫婦人悲苦無依之嫌。職此之故，倒不如以「不淑」乃指亂世之時遭逢死喪之不幸，而以該女為「嫠婦」，將更能凸顯婦人孤苦無依之慘況。甚且倘若深究造成夫婦「仳離」之狀況，丈夫遺棄妻子固然可以居其一，然而亦可如姚際恆所言，乃是亂世之下人民普遍存在的「流離失所」所致；至於「不淑」之義，亦可如姚氏所言，而為婦女遭遇「夫死」的不幸之義，如此一來，則將更能呈現亂世之下常見的不幸狀況。

對照禮書所載，〈雜記〉載有諸侯派遣使者以「寡君使某，如何不淑！」為對喪家行弔之辭，且〈曲禮〉於「知生者弔，知死者傷。」之《注》，亦載有「皇天降災，子遭罹之，如何不淑！」之弔辭，<sup>41</sup> 皆明顯以「不淑」為施於對死者的哀傷之辭，則「不淑」可指人遭遇死喪之不幸，應屬實為有據。倘若依照此義詮解「仳離」與「不淑」，則全詩又另有一番氣象：首章之「仳離」，乃言亂世夫妻之流離，屬於「生離」之狀況，偏偏又遇上饑饉之荒年，生活愈加窮困；次章之「仳離」，乃言原本「生離」之狀況，更碰上雪上加霜之不幸，以致成為「惻

<sup>40</sup> 其詳參見〔明〕李時珍：《本草綱目》（北京：人民衛生出版社，2005年2版），卷15〈草部〉，頁951-952：「《本經》益母，《爾雅》蓷，一名茺蔚，生海濱池澤，五月采葉，九月采實。」〔宋〕嚴粲：《詩緝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60年11月據味經堂本影印），卷7，頁10：「據《本草》，茺蔚正生海濱池澤，其性宜濕。」聞一多：《詩經通義乙》，收入《聞一多全集（四）》，頁180-181，以為〔清〕金鶚〈釋谷〉對於谷之有水、無水，論之已詳。此外，又另引《管子·度地》「山之溝一有水，一無水，命曰谷。」之古說，說明谷不必有水，其有水者暫，無水者常。再就〈葛覃〉、〈伐木〉、〈白駒〉等詩，說明其谷皆無水，則其他詩篇可以類推之，因而以毛《傳》「陸草生谷中，傷於水。」以及正鄭《箋》「離之生谷中，得水則病將死。」之說有誤。

<sup>41</sup> 此兩則資料分別見於《禮記正義·雜記上》，頁727；〈曲禮上〉，頁54-55。



獨鰥寡」的「死別」，其境況更慘似一層；末章之「伣離」，則為婦女遭遇夫死的絕對性分離，致使該女成為完全孤苦無依之可憐嫠婦，僅能啜泣不已，而始終淚流漣漣，於是最後只能以「何嗟及矣！」的無言之嘆收束全詩，更見其悽苦無奈，而令人油然升起同情悲憫之心。全詩以益母草之錯生不常有水之谷中，比況該女身處戰亂之國「生非其地」的不幸；再以遭遇荒年，寫其「生不逢時」之悲；更以夫死之災，寫其遭遇「禍不單行」之無助——則益母草之立而枯槁與該女之孀獨孤寡，乃兩相比併，而令人油然滋生憐憫之情的類同狀態。審視此婦女之悲慘境遇，饑饉之天災固有其本，然而挑起戰亂之人禍，實則危害人民之生活更厲害。故知「有女伣離」，未必只有男人負心一途。蓋於亂世之中，男人外出謀生，已備嘗艱辛困苦，倘若所遭逢的，竟是不知歸期的軍戎之征，則不幸而死，乃時有所聞之「常事」，而無法怪罪或怨恨夫君者。此詩所描述者，乃亂世之下常見之夫婦伣離，卒至夫死他鄉，孀婦孤苦無依，仍須獨自面對殘生之悽苦現象，因而全詩所流露者，雖然悲嘆之義一層深似一層，然而並無婦女怨恨夫君薄情寡義之辭。固然挑起戰禍，導致人民亂離之罪魁禍首確實可恨，但是，再多的嗟嘆怨恨都於事無補，因此詩人最終乃以「何嗟及矣！」作結，再度顯現「以禮節情」之蘊藉與重要：唉聲歎氣、憤慨怨恨都無法改變任何事實，再艱苦之人生際遇，亦須勇敢面對！亦唯有勇敢面對，始能旋乾轉坤，再為日後的生活開創生機！

### （三）苦中作樂之詩

〈君子陽陽〉一詩，《詩序》以為「閔周也。君子遭亂，相招為祿仕，全身遠害而已。」

<sup>42</sup> 朱熹雖認為《詩序》之說亦通，然而懷疑此篇乃承接〈君子于役〉的婦人所作而來。朱熹以為「其夫既歸，不以行役為勞，而安於貧賤以自樂，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，皆可謂賢矣。」<sup>43</sup> 姚際恆反對《詩序》與朱熹之說，以為《詩序》「君子遭亂，相招為祿仕」之說，乃根據「招」字而臆說；朱熹懷疑此篇為前篇婦人所作，則根據「房」字而誤說。姚氏又認為樂必用詩，故作樂者亦作詩摹寫之，然而其人其事則不可考。<sup>44</sup> 至於方玉潤則以「三代賢人君子，多隱仕於伶官，以其得節禮樂，可以陶情淑性而收和樂之功。」故而出入皆能揚揚自得其樂。不過，又認為「為國而使賢人君子樂處下位，不欲居尊以任事，則其時勢亦可想而知」。<sup>45</sup>

此篇之風格雖然與其他表現時局動亂，王室被迫遷都洛陽，人民流離失所之悲苦狀態有異，然而仍不脫時局亂離大勢下的眾生相之一。由於周王室不但在廟朝之上設有專職之舞師與樂工以備奏樂，並且在退朝之後，尚且還有房中樂之演奏；故此「右招我由房」，當可依

<sup>42</sup> 《詩序》，見於《毛詩正義》，頁149。

<sup>43</sup> 其詳參見〔宋〕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43。

<sup>44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，頁72。

<sup>45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，頁194。

據胡承珙所言，乃指「人君燕息時所奏之樂」。<sup>46</sup> 至於「右招我由敖」，則可依據馬瑞辰所言，「敖」疑讀爲〈驚夏〉之「驚」，乃指《周官》之鍾師所奏〈九夏〉中之〈驚夏〉。<sup>47</sup> 此外，誠如程俊英等所言，簧與翻的歌舞工具，並非當時貧賤者所能擁有；再對照詩中所呈現「君子陽陽」、「君子陶陶」以及「其樂只且」的君子自得其樂之狀態，或者可以如其所言，此詩寫東周王室苟安於洛陽，外患頻仍，內政不修，百官廢弛，自然無餘力以管理眾樂工們，故而樂工也就高興地自得其樂。<sup>48</sup> 此情此景，相對於其他各詩的淒苦悲涼，無疑地，實有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莫待無酒空對樽！」苦中作樂之感覺，也有「有花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！」行樂須及時之感。至於其背後，仍然無法擺脫亂世中思求偷安一時的大陰影。此從聞一多所言可以窺知一二：根據毛《傳》「翻，蠹也。蠹，翳也。」《箋》「翳，舞者所持，（所）謂羽舞也。」以及〈海外西經〉「大樂之野，夏后啓于此舞九代；乘兩龍，雲蓋三層。左手操翳，右手操環，佩玉璜。」之載，<sup>49</sup> 聞一多以爲此詩「簧」與「翻」並舉，「簧」應从羽从王，讀若「皇」，即《周禮》的〈樂師〉及〈舞師〉所載的「皇舞」，乃舞師持五彩羽毛，跳舞時自翳其首，藉以裝扮鳥形之舞，<sup>50</sup> 亦有寄寓世亂不忍見，爲樂須及時的無奈感。

對照《論語》以及《左傳》所載，周王室衰微之際，多有樂師、樂工們攜帶典籍、樂器等出逃而入他國之事，<sup>51</sup> 則此詩所描述未出逃之樂工們以歌舞自得其樂之情景，就更可理解。畢竟時局雖亂，生活仍然要過，既然未選擇出逃，就更該懂得自我調適之道，以達到自我內在心境與外在環境之協調。雖然此舉無法改善外在局勢之紊亂，然而卻足以促使內在心靈獲得某種程度之平衡，此亦不失在無法積極做爲之下，仍能活用「禮以節情」的平衡原理，以爲身處亂世時的生活哲學。

### 三、征夫怨訴詩的禮教思想

〈揚之水〉以及〈大車〉屬於征夫戍卒怨訴之詩。

〈揚之水〉一詩，《詩序》以爲「刺平王也。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，周人怨思焉。」

<sup>46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胡承珙：《毛詩後箋》，收入王先謙編：《皇清經解續編》（臺北：復興書局，1972年）第7冊，卷6，頁5230。

<sup>47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收入王先謙編：《皇清經解續編》第6冊，卷7，頁4707。

<sup>48</sup> 其詳參見程俊英、蔣見元：《詩經注析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年），頁199-200。

<sup>49</sup> 其詳參見《詩·王風·君子陽陽》，見於《毛詩正義》，頁149之毛《傳》與鄭《箋》；《山海經·海外西經》，見於〔晉〕郭璞注，〔清〕郝懿行疏，袁珂校注：《山海經校注》（臺北：洪氏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頁209。

<sup>50</sup> 其詳參見聞一多：《詩經通義乙》，頁178-179。《風詩類鈔甲》，收入《聞一多全集（四）》，頁469。

<sup>51</sup> 《論語注疏·微子》，頁167：「大師挈適齊，亞飯干適楚，三飯繚適蔡，四飯缺適秦；鼓方叔入於何，播鼗武入於漢，少師陽、擊磬襄入於海。」《左傳·昭公二十六年》，見於〔晉〕杜預注，〔唐〕孔穎達疏：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，收入《十三經注疏（附清·阮元校勘記）》，頁902：「王子朝及召氏之族，毛伯得、尹氏固、南宮鬻奉周之典籍以奔楚。」

<sup>52</sup> 朱熹抓住申國爲平王之母家而大作文章，認爲「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，則申侯者，王法必誅，不赦之賊，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。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，知其立己爲有德，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，至使復讎討賊之師，反爲報施酬恩之舉，則其忘親逆理，而得罪於天已甚矣。」<sup>53</sup> 姚際恆以朱熹所言平王與申侯有不共戴天之讎，與詩旨無涉；且甫與許均非平王之母家，故《詩序》之說爲臆說；詩雖於閒文有變換之事，然而戍防之事乃具體實事，不應以虛文視之。<sup>54</sup> 方玉潤駁斥《詩序》偏云「戍于母家」，遂啓朱熹一番「忘讎逆理」之論，乃未嘗就當日之形勢而思的結果。因爲「周轍既東，楚實強盛。京洛形勢，左據成臯，右控崤函，背枕黃河，面俯嵩高。則申、甫、許實爲南服屏蔽，而三國又非楚敵，不得不戍重兵以相保守，然後東都可以立國。」至於其所以招致民怨而見諸歌詠者，則「以徵調不均，瓜代又難必耳。夫徵調不均則勞逸異勢，瓜代難必則生聚無期，不惟小民怨咨，亦足見秉國者之措置乖方，籌謀未善。」<sup>55</sup> 崔述則以經傳固無申侯與弑幽王之事，而全詩乃傷王室之微弱，並無刺平王之意。然後又更進一步就當時時勢與地勢，以爲申與甫、許皆楚北出之要衝，而申倚山據險，其地尤爲重要。楚不得申，則不能侵陵中原，因而申之於楚，猶函谷之於秦。至於甫，即呂。若無申、呂，則晉、鄭必至於漢；楚師度申、呂而北，則必經許。平王之世，申漸弱而楚日強，故發王師以屯戍之。由此可見平王之戍三國，非私其舅與同姓，實乃大勢所趨，而不得不然。<sup>56</sup>

當位居南方之楚國勢力逐漸增強，而周王室卻日趨式微之相對消長狀態，平王派兵遠戍申、甫、許三國，原本勢在必行而無庸置疑，然而瓜代無期、勞逸不均之現象，又可能陷王室於國勢積弱難振之泥淖，且必然導致民怨四起之結局，尤其以首當其衝的征夫爲最。基於此背景，〈揚之水〉全詩三章，都以「揚之水」起興，分別從「不流束薪」、「不流束楚」、「不流束蒲」的一字之變，感傷激盪之水流無法漂送成捆的薪柴、楚木與蒲草，僅能將其無情地沖散；而無能的政府，卻又對柔弱之人民展現其崇高的王權，無限期地徵調民夫，導致夫妻生離、彼此聚首無期，僅能兩地空相思之情況。由於思歸無期，百無聊賴，僅能突發奇想，再藉由「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申」、「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甫」、「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許。」之排比形式，以自我調侃、自我解嘲之筆法，轉從反面稍稍埋怨其妻不來相伴之苦，以凸顯征夫思妻之切。最後，則於每章之末，都以「懷哉懷哉！曷月予還歸哉？」之統一模式作結，強烈表達征夫懷念家鄉，思念妻室的感情。整體而言，征夫思鄉念妻之情雖然強烈，然而並無強硬憤激之詞，而是透過反面調侃的特殊想像，以及反複出現「懷哉」與「還歸」之迴盪

<sup>52</sup> 《詩序》，見於《毛詩正義》，頁150。

<sup>53</sup> 其詳參見〔宋〕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44。

<sup>54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，頁72。

<sup>55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，頁194-195。

<sup>56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崔述：《讀風偶識》，卷3，頁3-6；其詳並可參考《考信錄·豐鎬考信錄》，收入王雲五主編：《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8年）第362冊，卷7，頁394。

聲中結束整首詩，則更能彰顯「以禮節情」之義，而蘊藏男子內心豐厚之感情。

〈大車〉一詩，《詩序》以爲「刺周大夫也。禮義陵遲，男女淫奔，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。」<sup>57</sup> 朱熹認爲「周衰，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，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。」而有「生不得相奔以同室，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。」之說。<sup>58</sup> 姚際恆認爲《詩序》以及朱熹之說不但迂折，且「夫婦有別」豈「異室」之謂？古大夫又何爲使夫婦「異室」？淫奔苟合之人，其死後，又豈有使之「同穴」之理？故知其說無以解「穀則異室，死則同穴」之義；因而贊同此爲周人從軍，而訊其室家之詩。<sup>59</sup> 至於方玉潤亦以此詩爲征夫之歎，因爲若從《詩序》之說，則無以處「穀則異室」之言；若從《集傳》，則無以釋「死則同穴」之語。故而方氏有「周衰世亂，征伐不一，周人從軍，迄無寧歲，恐此生永無團聚之期，故念其室家而與之訣絕如此。」之言。<sup>60</sup>

此詩雖寫王畿之人民被迫長期出征、從事勞役，然而誠如糜文開夫婦所言，全詩不作正面申訴，而從側面書寫妻室懷疑其夫久征不歸，乃別有所戀，致使其夫要指日爲誓，而有「穀則異室，死則同穴」之誓辭，正反映出久征之悲苦。<sup>61</sup> 全詩透過「大車檻檻，毳衣如綦」以及「大車哼哼，毳衣如璫」，使大車車聲從原本的「檻檻」到「哼哼」的笨重遲緩，描寫即使是老牛，也已因工作過久、過累，而難以拖動滿載征夫之大車。再藉由車衣氈毛之形象的前後改變，從原本的顏色青新，到後來因細毛脫落而出現一片赤赭的老舊狀，刻畫征途生活之艱苦，出征時日之長久，而有不知能否全身返鄉之哀戚與悲涼。然而還有比這種惡劣生活條件更不幸的，則是內心的煎熬與苦悶，於是再透過「豈不爾思？畏子不敢。」與「豈不爾思？畏子不奔。」的迴環往復，將征夫思念妻室的綿綿情意與畏懼軍威懲戒的惶恐，導致不敢輕舉妄動以逃奔返家的複雜情緒表露無遺。征夫之身心承受如此雙重煎熬，竟還遭到妻子之懷疑，因而只能指日爲誓，而有「穀則異室，死則同穴」情意真摯、詞語淒切之誓言。

固然男兒有保家衛國之責任，然而面對王室衰微，政局日趨動盪之情況，再加上將領又指揮無度等等因素，以致征期毫無期限之狀況，則恩愛夫妻難免有時也要多心，懷疑對方是否仍然對自己忠貞不二。夫妻遭遇此無奈之分離，如何適當表達對對方的堅貞愛意即非常重要。有別於其他各國風詩普遍出現妻對夫的懸念與關懷，以表示婦人思念征夫之詩篇，此詩乃轉從男子之立場，並且藉由指日爲誓之方式，表達丈夫對妻子信守不移的感情，更能說明夫婦有情有義乃相對的，並非僅僅對於爲人妻、爲人婦者的單方面要求，故而此詩在彰顯夫婦的情義觀上，尤其具有深刻意義。

<sup>57</sup> 《詩序》，見於《毛詩正義》，頁153。

<sup>58</sup> 其詳參見〔宋〕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43。

<sup>59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，頁74-75。

<sup>60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，頁200。

<sup>61</sup> 其詳參見糜文開、裴普賢：《詩經欣賞與研究（一）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87年），頁363-364。

#### 四、男女思念詩的禮教思想

〈采葛〉以及〈丘中有麻〉屬於男女相悅思念之詩。

〈采葛〉一詩，《詩序》以爲「懼讒也。」<sup>62</sup> 朱熹以爲采葛所以爲絺綌，蓋淫奔者所託以指人，且因思念之深，故雖未久而以爲久。<sup>63</sup> 姚際恆以爲「懼讒」之說無據，「淫奔」之說尤可恨；認爲以此爲婦人思夫之詩並無不可，且以此爲懷友之作更適宜。此外，葛生三月而採，蕭又採於最易懷人之秋，艾則長至三年始有治病之功，故三月、三秋、三歲之文，實頗富巧思。<sup>64</sup> 方玉潤則以此爲千古懷友之佳章，而以朱熹之說爲刻薄。其中，方氏所謂「良友情親，如同夫婦，一朝遠別，不勝相思，此正交情濃厚處，故有三月、三秋、三歲之感。」之說，<sup>65</sup> 正有其合理之處。

此詩以采葛、采蕭、采艾並列，則葛、蕭、艾三類植物，宜如聞一多所言，應具有同質性，且「葛」，應如〈葛覃〉所載，乃「是刈是穫」，而非「采」之以得，因而此處之「葛」，並非用以織布之「葛」，而應爲香草類的「藹」。聞氏又根據《周禮》所載，以鬱人由於掌祭祀祿事之故，因此必須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」，而賈《疏》更引《王度記》「天子以鬯，諸侯以薰，大夫以蘭芝，士以蕭，庶人以艾。」之說，<sup>66</sup> 則可知蕭、艾都爲蒿類之香草，故可爲祭祀鬯酒之用。既然蕭、艾爲香草，所以此詩之「葛」也應與蕭、艾同一性質，當讀爲「藹」。由於採集之工作多爲女子之事，因而聞一多以此詩應爲男子思念採集香草之女子所作之詩。<sup>67</sup> 經查「藹」即是藹車香，與今蘭香、零陵相類，可去臭，辟惡氣，<sup>68</sup> 因而確可與蕭、艾同類。正因爲一般女子之職事以採集爲主，所以女悅男之時，除卻可以如〈木瓜〉所載，以瓜果相投擲以示意外，亦往往以易得之花草爲贈，如〈靜女〉、〈溱洧〉之類。由於男子思念女子之情深，因此即使僅僅「一日不見」，然而內心的懸念，竟然有如三月、三秋、三歲之綿長與久遠。此詩乃從另一側面，再寫當時之男女在平常交往之時，有相贈香草以示好感之習俗。

〈丘中有麻〉一詩，《詩序》以爲「思賢也。莊王不明，賢人放逐。國人思之，而作是詩也。」<sup>69</sup> 朱熹以爲婦人望其所與私者不來，故疑丘中有麻之處，復有與之思而留之者，且又希冀子嗟、子國可以佩玖相贈。<sup>70</sup> 姚際恆認同「思賢」之說，且以「留」爲「留住」之意，而「子嗟」、「子國」與「之子」皆非人名，「嗟」與「國」同屬助辭（然而「國」難爲助辭）。

<sup>62</sup> 《詩序》，見於《毛詩正義》，頁153。

<sup>63</sup> 其詳參見〔宋〕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46-47。

<sup>64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，頁74。

<sup>65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，頁199。

<sup>66</sup> 其詳參見《周禮注疏·春官·鬱人》，頁299之經文以及賈《疏》。

<sup>67</sup> 其詳參見聞一多：《詩經通義乙》，頁186。《風詩類鈔乙》，收入《聞一多全集（四）》，頁503。

<sup>68</sup> 〔明〕李時珍：《本草綱目》，卷14〈草部〉，頁898。

<sup>69</sup> 《詩序》，見於《毛詩正義》，頁155。

<sup>70</sup> 其詳參見〔宋〕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47。

<sup>71</sup> 方玉潤則以此乃「招賢偕隱」之詩，以爲「丘中有麻」可以績而衣，「丘中有麥」可以種而食，「丘中有李」可以餽贈，因而爲招賢以共隱之詩。<sup>72</sup>

由於此詩三章，僅有首章末句「將其來施施」爲五字句，其餘皆爲四字句，因此學者多有以此應爲「將其來施」者；<sup>73</sup> 如此，則全詩之句法一致，且能與次章末之動詞「食」相對成文。固然歷來對此詩之解說，大約有上述思賢、私奔以及招賢偕隱三類，然而若從詩中出現「貽我佩玖」之詞，則知此詩應與男女之定情有關，而程俊英等即以爲此乃一女子敘述其與情人定情過程之詩。<sup>74</sup> 首章先言女子之認識「彼留子嗟」者，乃因爲該男子前來協助種麻而使彼此有相識之因緣。<sup>75</sup> 次章則言當麥子成熟時，女家邀請子嗟之父前來吃飯。此兩章之安排，先言人子，再言其父，似有顛倒尊卑之嫌，然而若從人子幫助種麻，其父接受女家之感謝與招待，則此安排正是合情合理，而足以彰顯女家感謝男子助耕的有禮之事。同時，次章插入招待子嗟之父來食，其實也爲末章「彼留之子，貽我佩玖」預留伏筆。蓋依禮而言，男子娶妻，必告父母，<sup>76</sup> 因此次章插入子嗟之父的子國出場接受招待，乃以婉轉陳辭之方式說明此男女之定情，已獲得雙方父母之默許。既已獲得雙方父母之首肯，於是在李子之果實成熟季節，子嗟正式贈送佩玉給女子，表示兩人的感情也已到達成熟而可以定情之意。此詩寫男女定情之前，已經事先經過雙方父母之默許，正顯示古代男女從交往到定情之合理程序。此詩不必如聞一多所言，以「施」與「行雨」爲同義詞，乃男女「交合」之隱語，而今本作「施施」者，則以小儒惡其言之直而傷雅，遂改「施」爲「施施」。<sup>77</sup> 當然此詩更非如朱熹補風捉影之說，認爲此乃一婦人而望二男子之來，且又懷疑其中之男子又與人有私情的男女私奔淫穢之詩。

<sup>71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，頁 75。

<sup>72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，頁 201-202。

<sup>73</sup> 〔清〕臧琳：《經義雜記》，收入《拜經堂叢書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1 年），卷 28，頁 10：「考《詩·丘中有麻》三章，章四句，句四字，獨『將其來施施』五字，據顏氏說，知江南舊本皆作『將其來施』，顏以傳箋重文而疑其有誤。然顏氏述江南江北書本，江北者往往爲人所改，江南者多善本，則此之悉單爲『施』，不得據河北本以疑之矣。」

<sup>74</sup> 其詳參見程俊英、蔣見元：《詩經注析》，頁 216。

<sup>75</sup> 其詳參見〔清〕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卷 7，頁 4712：「施亦爲也，助也。」

<sup>76</sup> 《詩經正義·齊風·南山》，頁 196：「取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。」《孟子注疏·滕文公下》，頁 109：「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，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。父母之心，人皆有之。」

<sup>77</sup> 其詳參見聞一多：《詩經通義乙》，頁 190。

## 五、結論

綜上所述，在區分為三類的〈王風〉十首詩中，其中六首，描述平王東遷後，社會動亂、宗室殘破、人民流離失所的悲涼情況，且另外還衍生兩首有關征夫戍卒的怨訴之詩，均將歌詠之目標集中在周王室勢力衰頹下所導致的各項狀況，因而每首詩之場景都能合乎王城所在地的特殊性質。由於政治上歷經重大變遷，因而感傷悲憫之情與憂戚難安之意時時充斥於字裡行間，自然是合理的現象，然而若硬要以此為譏刺平王之詩，則不免有訴諸情緒的非理性之嫌，因而也是不盡公平的無禮行為。幸而「刺平王」之說，乃《詩序》所為，並非詩文本身所透露之訊息。詩文所見，雖然在整個大時代環境下，感覺敏銳者不免滿懷憂心與悲憫，然而歷經王化薰陶之詩人，畢竟具有深厚之涵養，即使有悲憂之情，但都不至於反應過分激烈。由此可見此類詩文皆能展現「以禮節情」、「以理化情」之特質，且能適時、適可地調整自我心中的憂思之情，因此合乎「發乎情而止於禮義」的大原則，而呈現「溫柔敦厚」的《詩》教之風。

至於描述男女思念之情的兩首詩，經由上述討論，都與「淫奔」或男女交合之事無關，而實與當時的社會生活習俗有關。此兩首詩再次證實當時男女社交，女子多有以隨手採集所得的香草贈予心儀之男子，男子則回贈以佩玉之類的飾物以定情之狀況，且此種情形在當時又應是常見的社會習俗。由於香草為女子所採贈，一旦男子心有所感，則有〈采葛〉「一日不見」采葛之少女，竟然有如隔三月、三秋、三歲的久而難耐之感覺，雖然屬於「誇飾」之寫法，卻也是相當傳神的「如真」之感，此乃發乎人情之自然表現，而非無禮的「淫奔」之辭。〈丘中有麻〉之詩，若能從生活禮俗之立場體會各章之文義，則更能說明古代男女之交往，亦不乏在雙方父母相知或熟識之情況下進行彼此正常的交往者，逮及男女雙方之感情進行到成熟之程度後，才依禮由男方採取主動，贈送「佩玖」給女方，表示定情之意。如此參照生活禮俗以解詩，則整首詩之詩義不但完整，而且還能彰顯青年男女從正常社交到正式定情之過程，自有合於禮義之處。